

社会学视角下产权研究范式的比较分析

——以中国集体林权改革研究为例

朱冬亮 蔡惠花

(厦门大学 公共事务学院 福建 厦门 361005)

提 要: 不同分支学科分别采用不同的研究范式对产权的定义、作用和产权变迁等进行了探讨。从社会学视角分析比较不同范式并结合政治经济学关于产权制度“可信度”的理论观点,提出中国集体林权改革背景下的产权研究应该重点关注产权建构的政治过程,即产权是如何在各主要行动者的互动中被建构起来的。

关 键 词: 权利产权;关系产权;政治建构;可信度

中图分类号: C912.8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3-3637(2013)06-0006-04

自卡尔·马克思、杜尔凯姆和马克斯·韦伯以来,已有部分社会学学者从社会学角度探讨、解释和研究产权议题^①,但总体上社会学对于产权的研究仍然是凤毛麟角^②。产权制度对经济绩效的影响被新制度经济学及其他分支学科学者所肯定,而它对经济不平等的影响则是社会学家颇为感兴趣的。卡拉瑟斯(Carruthers)与阿里沃薇茨(Ariovich)从社会学视角阐述产权的五个重要维度(产权的客体、产权的主体、产权的使用、权利的实施和产权的转移),并在回顾文献的基础上,提出产权对经济不平等和经济绩效产生重要影响^[1]。越来越多社会学学者参与产权的研究,但是针对具体产权及其变迁的理论研究与实证研究较少,更少有针对产权研究范式的讨论。本文在比较研究产权的不同分支学科的范式以及他们在产权制度的定义、作用和变迁内容的不同的基础上,试图结合政治经济学的产权“可信度”观点,用政治—文化范式桥接历史制度主义和网络分析范式,以中国集体林权制度变迁研究为例探讨中国社会的产权研究范式。

一、历史制度主义范式:权利产权

一旦交易成本为零且对产权界定是清晰的,那么法律规范并不影响合约行为的结果,即最优化结果保持不变^[2]。只要交易成本为零,产权清晰,那么无论产权归谁,都可以通过市场自由交易达到资源的最佳配置。但科斯通过对市场交易成本的考察之后,同样承认“在市场交易中不存在成本”这是一种“很不现实的假定”^[2]。因此,寻找选择合适的社会安排来解决有害的效应(外部性效应)就显得尤为重要。产权的主要功能在于为获得更大的外部性内在化提供引导激励^[3]。阿尔钦与德姆塞茨将产权视为“一束权利”:人们所拥有的不是资源本身,而是拥有使用资源一束或一部分的权利,并且与所有权(ownership)不同的是,产权是一组权利,其中每一项权利都可以独立出来,不同的产权可以重组^[4]。这就是制度经济学对产权的界定。

从研究范式上看,德姆塞茨和阿尔钦是从历史制度主义方面研究产权的功能、起源和发展的。德姆塞茨从北美印第安人狩猎皮毛事件出发,从历史角度提出产权是伴随着新的或者不同有利或有害的效应而出现的。正是由于资源的稀缺,才促使印第安人创造了产权的概念^[3]。后来,通过对1600—1850年

间世界海洋运输生产率变化的研究,在技术没有发生变化的情况下,诺斯发现通过制度创新或者变迁也能提高生产率、实现经济增长^[5]。有效率的经济组织是经济增长的关键,最终促成了西欧在18世纪初的崛起^[6]。诺斯等回顾了16到18世纪西欧主要国家的制度安排,通过对比发现,法国、西班牙发展了一种税收制度,该制度保护了当地和地区的垄断,却扼杀了创新与市场要素的流动,从而最终导致了生产性的经济行为的下降。而在荷兰和英国则不同,前者发展了商业的寡头政治集团,后者则是产生了超越王权的议会,这两者都出现了持续的经济增长。荷兰与英国的政治制度演变恰恰为产权主体的演变提供了一个良好的环境。因此,经济能否增长往往受到有无效率的产权制度的影响。

产权之于经济增长,在于包括产权在内的制度及其制度变迁的方式塑造了经济绩效,并与所运用的技术共同决定了交易与生产的成本^[7]。制度建立组织,为组织制定行动的规则,并且反过来,制度的变迁是通过组织活动来完成的。制度变迁的方向是有路径依赖特征的。作为一种制度的模型所产生的政治、经济组织,都会偏向于保持现有制度框架。然而,由于变迁的外部资源弱化了现有组织的权力或加强了不同利益集团的力量,或对现有组织的政策的未预期结果的反应,路径也会因此而改变内容或者往相反方向改变^[7]。

历史制度主义范式下的产权分析,为其他学科解释经济现象提供了重要的产权理论基础。从社会学视角看,制度经济学存在以下值得商榷的地方:一是虽然诺斯也强调,制度包含的正式和非正式制度,但他总是忽略非正式制度的作用,也忽略了不同行动者在产权建立、制度变迁过程中的微观互动;二是“后来者们”总是将产权视为“理所当然”存在的,忽略了当代产权是如何被建构出来的;三是界定清晰的产权制度才能对经济增长有促进作用的学科观点忽略了社会行动者的认知或者“主观能动性”,因为从社会行动者对于制度的认知角度看,某些具有可信度(credibility)^③的“有意模糊”(deliberate ambiguity)的产权制度却同样也可以促成某些改革的成功^[8]。

二、网络分析范式:关系产权

通过对1970年代波士顿地区专业人士找工作过程中所利用的社会关系的研究,格兰诺维特发现弱关系的力量强于朋友

和家庭的强关系 因此,他将波兰尼的“嵌入性”概念^[9-10]引入他对找工作行为的分析之中^[11]:找工作的行为不只是一个理性经济过程 更是嵌入于其他几乎限制和决定其内容和结果的社会过程之中^[12]。人的行动紧密嵌入在人际网络关系中,即强调具体的个人关系和此种关系的结构^[13]。

周雪光试图从社会学制度学派的解释逻辑建构不同于经济学“权利产权”思路的分析框架。他建立了“产权是一束关系”的解释框架和“关系产权”的概念,由此为解释产权在中国转型经济中扮演的角色和有关的经济现象提供了一个不同的分析视角。一个组织的产权结构和形式是该组织与其他组织建立长期稳定关系适应其所处环境的结果。因此,产权结构和形式并不像经济学家所说的那样反映了企业的独立性。恰恰相反,产权反映了一个组织与其环境——其他组织、制度环境或者组织内部不同群体之间稳定的交往关联。产权的结构被用来维系和稳定一个组织与所处环境之间的关系^[14]。

相比历史制度主义范式,网络分析技术丰富了产权作为规则(尤其是非正式规则)在社会组织及其行动中的作用的观点。例如,产权不明晰也有其优势——关系产权同时在获取资源、机会、信息诸方面又可能增强企业的适应能力和竞争能力^[14]。

从社会学视角看,网络分析技术的产权研究仍然存在一些问题,值得反思。首先,“嵌入性”涵盖了太多分析性的概念,因而必须小心界定如此之多的“网络”等词,才能证明其分析能力,但要做到这一点并不容易^[15];其次,虽然格兰诺维特拓展了“关系网络”嵌入的具体研究,但其嵌入性在强调经济与人际关系网络不可分离的同时,却明显忽视了政治、文化和制度因素对经济行动的影响;最后,对于网络中有关位置之间的权力关系的静态分析也使得网络分析在解释产权制度变迁时显得心有余而力不足。例如,网络中的某种关系消失或出现,可能导致整个分析结论也有所变化,有牵一发而动全身的效应^[16],其理论解释力因此很容易受到质疑。虽然格兰诺维特将经济学的路径依赖理论引入对经济制度的事实建构理解之中,但是由于网络分析技术本身的局限使得很难用其进行动态的分析。

三、政治—文化研究范式:作为政治建构的市场规则

相比较经济社会学,市场社会学研究对象比较狭窄,它研究的是一种市场社会交换以及在资本主义条件下这种社会交换的建构^[17-18]。市场社会学创始人弗雷格斯坦将市场视为一个场域,提出市场的存在就是为了某些产品或服务的生产与销售,市场具有结构化交换的特征^[17]。这种结构化交换就意味着行动者期待重复交换他们的产品,因此,需要规则和社会结构来指导和组织交换。产权作为生产市场中社会结构的规则类型之一,其建构是一个持续的政治争夺的过程,商业、劳工、政府机构和政党等组织群体都在试图影响产权的建构^[17]。

当国家进入资本主义就会促使政府发展关于产权、治理结构、交换规则和控制观的规则以稳定市场。在市场制度建立的过程中可以看到一个群体或由工作者、资本家、政府官员之间组成的联盟的理想类型统治是如何影响市场构成的。从这些统治的理想类型也可以看出政府是如何干预市场,进而影响经济的。由不同类型统治群体组成的政府会有不同的制度安排,包括产权。每一个战略行动场域都是嵌入于一个更广泛的环

境之中,其形成、变迁和转变都会受到其他场域的影响^[22]。因此,产权的形成、变迁都会受到其他国家场域或非国家场域的影响。

这种市场社会学采用了政治—文化范式。该范式被描述为“社会行动发生在各种场所之中,这些场所可以被称为场域、领域、部门或组织化的社会空间。场域内的集体行动者试图生产出一种支配制度。而要达到此目的,则必须生产出一种地方性文化来对行动者之间的地方性社会关系进行界定。这里的‘地方性文化’包含认知的因素,可以定义社会关系,并且帮助人们解释他们在一系列社会关系中的自身位置。”^[17]

在借用政治学及其社会运动理论(social movement theory)的核心概念以及新旧社会学理论的基础上,弗雷格斯坦等发展了其场域理论(a theory of fields)^[16]。场域理论观点主要有三大组成部分:一是场域是由战略行动场域(strategic action fields)组成的;二是每一个场域都是嵌入于由无数个相邻或遥远场域或由国家组成的更为广阔的环境之中;三是理论的核心在于解释嵌入其中的社会行动者是如何适应和维持已有的秩序。弗雷格斯坦使用“共享的理解”(shared understandings)代替了之前的“地方性文化”,认为战略行动场域中的行动者是在共享的理解基础上规定他们之间的关系和互动的。这种共享的理解是由社会中的行动者运用社会技能(social skills)建构出来的。所谓社会技能是指(行动者)通过呼吁或帮助创造共享的意义和集体的身份来达到(他人)合作的能力^[16]。

市场社会学强调政治和文化维度的介入,而这一点正是网络研究范式所缺乏的,网络分析范式并不考虑经济制度中的政治模型和社会前提^[19]。场域和社会技能的解释工具同时也可以弥补历史制度主义的不足。因为新制度学理论学者一致认为,制度一旦存在,都会限制和促使行动者进行后续的制度建立,他们忽略了制度建立中社会权力和行动者的作用^[19]。

当然,在某些学者看来政治—文化的范式也有缺憾并需要修正,因为这一方法中的文化维度由于仅限于控制观的因素而显得过于狭隘,因而也很难说可以充当一种综合范式^[20]。实际社会生活中,行动者都有自己的社会网络,也就是中国人所说的“社交圈子”,个人的行动以及他们对他人的理解都会受到网络中的他人的影响。在研究中国产权制度及其变迁中依然离不开网络分析工具,因为产权制度不仅反映了行动者之间的关系,也会对市场制度(包括产权制度)的形成、转变产生重要影响^④。

四、结论与思考:以中国集体林权改革研究为例

产权作为一种制度,规定着人与人之间关系的规则,正式的产权制度对经济增长具有重要影响。各范式下的产权制度存在以下的差异。

第一,在权利产权的经济学观点中,私有产权制度一直占据支配地位,私有产权清晰才能降低交易成本、促进经济增长,而关系产权则认为产权反映了一个组织与其环境即其他组织、制度环境或者组织内部不同群体之间稳定的交往关联。产权的重要性在于,产权的结构被用来维系和稳定一个组织与所处环境之间的关系。

第二,相比权利产权,市场社会学更重视现代产权的政治建构过程及其各个组织、行动者对产权建构的影响。后者从政治—文化维度阐述社会行动者如何运用社会技能、通过集体行

动达到自己的目的。

第三,关系产权和政治建构的产权都被用于研究社会经济生活,但是前者由于网络分析技术本身的局限仍然倾向于静态分析,无法给读者提供一个产权制度动态的变迁分析框架。

此外,政治经济学家也将产权理解为一种制度,一种关于经济、政治和社会行动者对产权的特定状况下如何限制他们的行为的一系列稳定的、广泛共享的预期^[21]。为了发挥其限制个人或组织行为的作用,这种产权制度对主要经济、政治和社会行动者来说必须是可信的或可靠的(credible)^[21]。作为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产权不但形塑着社会的经济行为,而且通过对财富的生产与分配的影响来影响一个国家的政治稳定,而作为正式规则的建立者和执行者,国家在建立可信的产权制度中发挥着根本的作用^[22]。

中国的土地产权更是表现为分散的一束权利,任何行动者都无法拥有土地的绝对所有权,且土地产权反映社会行动者(包括个人、集体与国家)之间的关系。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农村集体林地产权经历了频繁的改革,林地产权的私有程度和公有程度也因此产生变化^[23-24],这些改革不但对农民的生计产生重要影响,而且因此产生了各种林权纠纷或社会冲突^[25],也对国家的经济发展与政治稳定产生重要作用。在中国新集体林改全面实施及连续出台一系列的配套改革措施背景下,林地产权制度及其变迁仍受到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结合中国集体林改背景和现有产权的研究范式,社会学视角下的产权研究可以尝试研究林地集体产权是如何在行动者的互动中被建构起来及其可信程度等相关问题。

第一,运用场域理论解释中国农村林业场域的产生、形成和变迁,研究各种群体中的主要行动者是如何理解和运用这些规则来达到集体行动目的,并最终在整个制度环境中稳定和进行变迁的。国家通过林权制度改革建构一个正式的制度来引导林业场域中各种不同行动者互动,以达到国家经济发展、政治稳定或环境保护的目的。基层地方行动者也在建构属于他们“统治”场域的正式制度,基层机构中的官员甚至也形成以自身团体利益为主的“地方法团主义”。而作为土地的“主人”——中国的农民及其村集体组织,对于产权规则的认知和建构也是无法被完全忽视的^⑤。在国家主导的农村新集体林改后,村级已经具有具体实施方案的决策权。林农也可能有意或无意识地影响国家林地产权改革。有相关研究表明,1980年代初,中国农村耕地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成功使许多林农要求林业部门也采用同样的家庭管理制度,这些想法在当时得到了许多中国共产党领导和政府领导的支持。于是,1983年6月林业当局同意或者说是“被迫同意”采用林地家庭承包责任制^[23]。因此,林农(尤其是拥有较高社会技能的林农)参与林地产权建构行动也是林业场域研究不可忽视的一部分。

第二,作为社会网络关系中的成员,主要行动者为达到行动的目的又是如何运用社会关系和网络资本对产权建构进行影响的。国内学者申静和王汉生认为产权作为行动者基于对经济品权利的相互认可而形成的行为关系,必然是一个动态的均衡的过程^[26]。这种通过洞悉乡村社会结构及其运行机制来分析中国农村集体产权是一个十分有趣的研究视角。中国是一个具有“差序格局”^[27]特征的大社会,乡村社会更是讲人情、关系和面子,因此主要行动者是如何运用“关系”资本参与产

权的建构与变迁是社会学视角下研究产权制度变迁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第三,现阶段产权制度的可信度及其对各行行动者的经济、政治和社会生活的影响如何也是很多学者感兴趣的。截至2012年底,全国(除西藏以外)29个省(区、市)已确权林地面积27.02亿亩,占各地纳入集体林地改革面积的99.05%,明晰产权的任务已经基本完成^[28]。但是现阶段林农、林业企业及其相关的市场行动者和地方政府对该产权的认知如何?这些认知对地方经济、国家林业经济或中国政治稳定是否产生影响?产权制度的可信度对后续的配套改革措施产生了怎样的影响?林农参与建构林权制度的行为及其与林权制度可信度之间的关系如何可能成为下一阶段学者研究的问题之一。

中国农村经济正处于转型时期,包括征地改革、林地流转等都处在探索之中。社会学视角下对产权进行的研究将有助于我们认识和解释这些现象背后的逻辑,认识不同行动主体如何参与产权制度变迁以及行动者的社会生活如何受到产权制度及其变迁的影响。

注 释:

①例如 Marx K. ,F. Engels. The German Ideology [M]. New York: International ,1947; Durkheim E. . Professional Ethics and Civic Morals [M]. Translation C. Brookfield ,New York: Routledge , [1957] [1992] 2003; Weber M. . General Economic History [M]. New Brunswick: Transaction Books , 1981.

②十几年来,国内有些社会学者围绕农村集体产权实践问题展开探讨,他们的研究推进了国内产权社会学的进展,例如张静. 土地使用规则的不确定: 一个解释框架[J]. 中国社会科学, 2003(1): 113 - 124; 申静,王汉生. 集体产权在中国乡村生活中的实践逻辑[J]. 社会学研究, 2005(1): 113 - 148; 折晓叶,陈婴婴. 产权怎样界定? ——一份集体产权私化的社会文本[J]. 社会学研究, 2005(4): 1 - 43; 等等。

③制度的可信度(credibility)首先由 Diermeier 等人提出,后来得到许多政治经济学学者的运用。参见 Diermeyer ,D. ,Ericson J. M. ,Frye , T. ,Lewis S. . Credible commitment and property rights: the role of strategic interaction between political and economic actors [G]//Weimer ,D. L. (Ed.)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Property Rights: Institutional Change and Credibility in the Reform of Centrally Planned Economie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7: 20 - 42.

④关于“关系网络与市场”二者的关系,社会学研究了社会关系和网络(即“关系”)如何形成中国市场,以及市场如何重新定义“关系”。参见 Ming - Cheng M. Lo ,Eileen M. Otis. Guanxi Civility: Processes ,Potentials and Contingencies [J]. Politics & Society 2003(31): 131 - 162.

⑤申静、王汉生试图从社会学视角解释中国乡村集体产权的建构过程。

参考文献:

- [1] Bruce G. Carruthers ,Laura Ariovich. The sociology of property rights [J]. Annual Review of Sociology 2004 ,30: 23—46.
- [2] Ronald H. Coase. The problem of social cost [J]. Journal of Law and Economics 1960 ,3: 1—44.
- [3] Harold Demsetz. Toward a theory of property rights [J]. 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967 ,57(2): 347—359.
- [4] Armen A. Alchian ,Harold Demsetz. The property right paradigm [J]. The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1973 ,33(1): 16—27.

- [5] Douglass C. North. Sources of productivity change in ocean shipping, 1600—1850 [J].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1968, 76: 953—970.
- [6] Douglass C. North, Robert P. Thomas. *The Rise of the Western World: A New Economic History* [M].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3: 1—18.
- [7] Douglass C. North. Transaction Cost, Institutions, and Economic Performance [M]. San Francisco: Institute for Contemporary Studies, 1992: 5.
- [8] Peter Ho. Who owns China's land? Policies, property rights and deliberate institutional Ambiguity [J]. *The China Quarterly*, 2001, 166: 387—414.
- [9] Karl Polanyi. *The Great Transformation: The Political and Economic Origins of Our Time* [M]. Boston: Beacon Press, 2001.
- [10] Karl Polanyi. *The Economy as Instituted Process* [G]//M. Granovetter, R. Swedberg. *The Sociology of Economic Life*. Boulder: Westview Press, 1992: 34.
- [11] Mark S. Granovetter. The strength of weak ties [J].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1973, 78(6): 1360—1380.
- [12] M. Granovetter. *Getting a Job: A Study of Contacts and Careers* [M].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5: 39.
- [13] 符平. “嵌入性”: 两种取向及其分歧 [J]. *社会学研究*, 2009, (5): 141—164.
- [14] 周雪光. “关系产权”: 产权制度的一个社会学解释 [J]. *社会学研究*, 2005, (2): 1—31.
- [15] N. Fligstein. Networks of power or the finance conception of control? Comment on Palmer, Barber, Zhou and Soysal [J].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1995, 60(4): 500—503.
- [16] N. Fligstein, D. McAdam. *A Theory of Fields* [M].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2: 30.
- [17] N. Fligstein. *The Architecture of Markets: An Economic Sociology of Twenty-first-century Capitalist Societies* [M].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1: 1—33.
- [18] N. Fligstein, Luke Dauter. The sociology of markets [J]. *Annual Review of Sociology*, 2007, 33: 105—128.
- [19] N. Fligstein. Fields, power, and social skill: a critical analysis of the New Institutionalisms [J]. *International Public Management Review*, 1997, 61: 656—673.
- [20] 符平. 迈向市场社会学的综合范式——评弗雷格斯坦《市场的结构》兼议其范式修正 [J]. *社会学研究*, 2010, (2): 211—225.
- [21] Mariusz Mark Dobek. Property Rights and Institutional Change in the Czech and Slovak Republics [G]//David L. Weimer.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Property Rights: Institutional Change and Credibility in the Reform of Centrally Planned Economie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7: 182—204.
- [22] David L. Weimer.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Property Rights* [G]//David L. Weimer.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Property Rights: Institutional Change and Credibility in the Reform of Centrally Planned Economie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7: 1—19.
- [23] Liu Dachang. Tenure and management of non-state forests in China since 1950: a historical review [J]. *Environmental History*, 2001, 6(2): 239—263.
- [24] 郑风田, 阮荣平, 孔祥智. 南方集体林区林权制度改革回顾与分析 [J]. *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 2009, 19(1): 25—32.
- [25] Peter Ho. Credibility of institutions: forestry, social conflict and titling in China [J]. *Land Use Policy*, 2006, 23(4): 588—603.
- [26] 申静, 王汉生. 集体产权在中国乡村生活中的实践逻辑 [J]. *社会学研究*, 2005, (1): 113—148.
- [27] 费孝通. *乡土中国* [M]. 上海: 上海观察社, 1947.
- [28]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林业局. 2012 全国林业年报分析报告 [R/OL]. (2013-05-10) [2013-07-28]. <http://www.forestry.gov.cn/uploadfile/main/2013-5/file/2013-5-10-0170dea800474abea944f4abc57af5b.pdf>.
- 基金项目: 本文受到国家留学基金委“2012 年国家建设高水平大学公派研究生项目(留金发[2012]3013)”的资助, 感谢爱尔兰国立梅努斯大学 Sean O'Riain 教授对本文写作的启发与建议。
- 作者简介: 朱冬亮(1971—), 男, 福建将乐人, 厦门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公共事务学院社会学系教授, 博士, 博士生导师, 研究方向为农村社会学; 蔡惠花(1984—), 女, 福建长泰人, 厦门大学社会学系博士生。
- 责任编辑: 胡政平; 校对: 鲁雪峰